



【名家背影】

## 气节陵夷谁独立

□ 肖复兴

《十力语要》卷四中,有这样一段话,记录了从来不读小说的熊十力读《儒林外史》的一则逸闻。他说:“吾平生不读小说,六年赴沪,舟中无聊,友人以《儒林外史》进。吾读之汗下,觉彼书之穷神尽态,如将一切人及吾身之千丑百怪,一一绘出,令吾藏身无地矣。”

熊十力头一次读小说,竟然将自己设身处地在小说之中,《儒林外史》中种种读书人的千丑百怪,成了他自己的一面镜子,照得他汗颜而藏身无地。这是只有熊十力这样的哲人与一般学者、评论家读小说的区别,很少有学者和评论家舍身试水,将小说作为洗濯藏污纳垢的自身的一池清水。

这是有原因的。熊十力一直坚持自己的“本心说”和“习心说”。这是熊十力的重要学说,也就是后来有人批判的唯心主义学说。他认为,“本心”是道德价值的源头,所以要坚持本心,寻找本心,发现本心。而“习心”则是从本心分化剥离出来的,是受到外界诱惑污染的异化之心。所以,他说拘泥于“习心”,掩盖了“本心”,从而偏离了道德的源头,便产生了善与恶的分化。

在这里,又出现了“善”与“染”两种概念,这是熊十力特别讲究的两个专有名词。他说:“染即是恶。”“徇形骸之私,便成乎恶。”他说“净即是善”,就是面对恶的种种诱惑“而动不迷者”。

于是,他强调坚持“本心”就要“净习”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要和染出的种种恶做自觉的抵制乃至斗争。所谓“净习”,就是操守、涵养、思诚,这些已经被很多聪明的现代人和“精致的知识分子”称之为无用的别名而早已不屑一顾。熊十力却说:“学者功夫,只在克己去私,使本体得以发现。”只是,如今的大部分学者和熊十力一辈学者已不可同日而语。所谓学者功夫,早已经无师自通的“功夫在诗外”了。

作为我国新儒家的国学大师,熊十力的学说博大精深,很多我是不懂的。但是,这个“本心说”和“习心说”,还是多少可以明白一些的,因为不仅他说得十分清晰明了,而且具有现实意义。这不仅是他的哲学观,也是他的道德观,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哲学观和道德观。

明白了这一点,我们也就明白了,1946年,他的学生徐复观将他的《读经示要》一书送给蒋介石,蒋介石立刻送给他法币两百万元。熊十力很生气,责怪徐复观私自送书给蒋介石,

拒收这笔款项,表现出一位学者的操守,亦即他坚持的“本心”所要求的“净习”。后来,架不住徐复观反复劝说,熊十力勉强收下了,但马上将赠款转给了支那内学院,如此之钱毫不沾手,可称之为“净”。

我们也就明白了,1956年,熊十力的《原儒》一书出版,得稿费六千元人民币。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,他拿一级教授最高的工资,每月也只有345元。六千元,相当于他一年半的工资总额,在北京可以买一套相当不错的四合院了。但他觉得当时国家经济困难,他不要这笔稿费。后来,也是人们反复劝说,他坚决表示只拿一半,不能再退让一步。

对于大多世人追逐的名与利,熊十力有自己的见解和操守。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:“所谓功名富贵者,世人以之为乐也。世人之乐,志学者不以为乐也。不以为乐,则其不得之也,固不以为苦也。且世人之所乐,则心有所逐而生者也。既有所逐,则苦必随之。乐利者逐于利,则疲精敝神于营谋之中,而患得患失之心生,虽得利而无片刻之安矣。乐名者逐于名,则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,而毁誉之情俱。虽得名,亦无自得之意矣。又且逐之物,必不能久,不能久,则失之而苦甚。”这段话,熊十力好像是针对今天而特意说的一样。他说得多么明白无误,名与利的追逐者,因为有了追逐(如今是名目繁多、花样百出的追逐),苦便随之而来,因为这些都是熊十力所批判过的“习心”所致。志学者因为本来就没有想起追逐它们,不以为乐,便也不以为苦,而求得神清思澈、心地干净。万顷烟波鸥境界,九秋风露鹤精神,落得个手干净、心清爽,精神宁静致远。熊十力方才能够无论世事如何跌宕变化而心有定海神针,坚持著书立说,一直坚持到77岁时完成他的最后一部著作《乾通行》。在这本书中,他夫子自道:“余患神经衰弱,盖历五十余年。平生常在疾苦中,而未尝一日废学停思……本书写于危病之中,而心地坦然,神思弗乱。”

只是,如今就像崔健的歌里唱的那样:不是我不明白,这世界变化快。熊十力所能做到的“神思弗乱”,已经让位于他所说的“逐”而纷乱如麻。这个“逐”,不仅属于他所说的世人,也属于不少志学者情不自禁的自选动作。不仅止于名与利,还要再加上权与色,如巴甫洛夫的一条高智商的犬,早知道以那条直线抄捷径去追逐他们所需要的东西。可怜的熊十力的“本心说”,在他的“习心说”面前,已经落败得丢盔弃甲。

想起熊十力的这些言说,便想起放翁曾经写过的诗句:气节陵夷谁独立,文章衰坏正横流。在这里,放翁说的文章并不只是说文字而已,而是世风,说知识分子的心思,也就是熊十力所说的“习心”。有了这样的“习心”的侵蚀,气节和操守方才显得那样的艰难和可贵。可以说,熊十力就是这样在气节陵夷时候特立独行而远逝的一位哲人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)

国学大师长寿者居多,季羡林96岁,梁漱溟95岁,钱穆95岁,冯友兰95岁,南怀瑾94岁,任继愈93岁。如果扩大到艺术界,也大抵如此,书法家启功93岁,国画家齐白石93岁。这些人活在折腾的年代,命途多舛,有时物质拮据,有时精神受禁锢,如果顺风顺水,享年或许会更长。当然,业界也有人短命,但大都因特别变故所致,不妨碍统计学得出的优势结论。国学家长命,有历史传统。孔子享年73岁,孟子84岁,现在看不算什么,但在2500多年前,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,70岁即被看做古稀之年。如果他们活在现代的生活与医疗条件下,“茶寿”(108岁)也是有可能的。

《黄帝内经》说:“上医治国,中医治人,下医治病。”给郎中安排的活儿太多了,好像是个万能职业。而且还有“医而优则仕”的味道,鼓励大夫们不务正业。古代官员的确写作“大夫”,只是读法不一样,全称是士大夫。《黄帝内经》无意鼓励医生们做官,而是想说明医学与国学相通。医道就是事道,医道就是人道,用来管理国家可以正社会,用来管理人民可以正众生,用来管理健康可以正性命。国医思维的基础是国学逻辑,国医都懂国学,而国学家不一定懂医术,但肯定懂医道。按照平衡规律行事,形成健康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,很容易治疗自己的“未病”,想不长寿都难。

长寿是成为大师的结果,也是原因。不长寿,时间不够,学问做不到位;做透学问,优化心态,有助于长寿。季羡林先生说自己满意的东西都是七十岁以后写的,年轻时没有积累不厚重,年龄和阅历给学者送来大礼,这便叫炉火纯青。学问和艺术都是功夫活儿,靠日子陪伴,如果打磨不到质变的程度,总会让人觉得差点儿成色。如今有些国学成果在文字表面运行,掰开揉碎以后你会发现,真知灼见不多。究其原因,就是没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做到学问中去,而且没进入人性深处,这就是性命双修的道理。

《论语》中说:“子之所慎:齐、战、疾。”战争与疾病都会把人弄死,与生命息息相关。“齐”为“斋”,《说文解字》释义:以手持肉的祭祀活动。人类面对灾难时力不从心,就恭请神灵保护生灵,原始宗教与生命质量相关。中国哲学认为,天地以生为道,人命是人性底线。孔丘三慎是中国文化的启动思想,他的入世学问是从这里出发的,生存是生存意义的

基础,首先要活着,然后才有资格考虑活着的价值。如果转化成现代人的说法就是:健康是1,事业、爱情、财富等其他因素都是后面的0,有了这个1,价值成10倍地增长;没有了这个1,人生全部归零。数字文化精准,可以简单地表达复杂的道理。

贝多芬在病榻上对舒伯特说,“我的灵魂是属于你的。”舒伯特死后长眠于贝多芬身旁,墓碑上写着:“死亡埋葬着巨大的财产,也埋葬着巨大的希望。”精神活力依附于生命动力,舒伯特践行着贝多芬的期待,代际辉煌在生命间传递。没有了肉体,精神还要向另外一条生命借路。

康有为先生说曾参在孔门弟子中是最为拘谨的一位,活得比较累。但小心点儿活着符合三慎说,从尊重生命的角度看,曾子可以说是楷模。他在病危时对弟子们说,自己一生“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,从而保全了身体。身体得之于父母,也得之于天然,珍惜生命是尽孝道,也是尽天道。人生需要拼搏,但除非必要,不可拼命。生命缩短了,奉献也少了。儒家重视使命感,但是不能过誉那种不要命的奉献精神。人一生能做多少事情是有数的,能喘多少口气也是有数的。气数将尽,人会突然领悟到什么,到那时一切都晚了,还是早些防微杜渐的好。行止有度,匀态为常。像曾子一样全身而退,来时光洁,走时完美,不枉此生。

活着重要,是不是只要活着就行?那是苟活,肯定不行。生命不但有生理意义,还有社会意义。周敦颐说:“天以阳生万物,以阴成万物。生,仁也;成,义也。”他把“生成”与“仁义”联系起来,怎样活着决定着能不能活得长久。程颐说:“生之性便是仁。”动物关注进食与繁衍,人要添加另外的内容,本性超越本能。仁者爱人,体现着对生命的尊重。朱熹说,“仁是天地之生气。”行仁道者求和谐,少有悖逆,多有平和,心态好,病就少,这便是福报。“程说”以“生”为“仁”,“朱说”以“仁”为“生”,仁生相证,互为内涵。把它们融汇到一起,是大境界。

对于孔子在《论语》中“仁者寿”三个字,后学有非常细致的解读:“气之温和者寿,质至慈良者寿,量至宽宏者寿,言之简默者寿,此为仁之端也,所以仁者寿。”和善宽容,少说多做,这既是修身的要求,也有健身效果,在精神栖息中感悟肌体清爽。经典文化中有生命道理,可以培育健康智慧。

(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)

## 【文化杂谈】

## 大师与长寿

□ 徐宏力